

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志愿服务研究

■ 丁志宏 梁伊绘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运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究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志愿服务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参与志愿服务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存在性别、年龄、收入、教育、党员身份、健康程度、流动时间和流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人口因素、资本因素、流动因素及社会融入因素等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流动人口 志愿服务 影响因素 推进路径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3.009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1]表明,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4亿,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2010-2015年,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7.2%上升到62.3%,规模从1408万人增加到近1.3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流动人口的重点工作在于全面推进市民化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破除阻碍人口流动的壁垒,促进市民化发展。社会参与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前提^[2]。参与流入地的志愿服务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参与。志愿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体现在宣传教育当中,而且在一些城市积分落户政策中,献血等志愿活动都为加分项目。

流动人口与志愿行为的关系过去更多体现在流动人口和志愿者之间,两者为“受助者”和“帮助者”关系,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接受志愿者帮助。但现在很多流动人口早已摆脱“受助者”身份,成为有能力的“帮助者”。他们具有强烈的参与公共事务、社区活动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志愿活动。因此,在促进市民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关注流动人口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以及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与所在城市的发展权^[3]。

研究发现,当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会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感,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4-6]。从流动人口自身看,志愿活动有利于他们适应周围环境,增强自我认同感,培养主人翁精神^[7],也有利于他们重建社会资本,借此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逐步演变为以业缘、趣缘为主的新型社会资本^[8]。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双方互动角度看,志愿活动可以促

收稿日期:2021-03-10

作者简介:丁志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人口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会老年学、人口经济学;
梁伊绘,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人口学。

进两个群体的交流和互动,增强双方的相互了解,降低心理隔阂和障碍,缩短双方距离^[9-11]。从社区角度看,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活动能增加居民归属感和社区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从而提高社区社会资本,强化社区整体的支持作用^[12]。

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有学者认为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不能反映未来年轻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需要一个更加合适的界定标准,例如“二代流动人口”^[13]。但段成荣等指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按年代或年龄对新生代的界定是合理的^[14]。

在以往研究中,我国对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研究主要隐含在社会融入中,专门的社会参与研究较少,且大部分以质性研究和区域研究为主^[15]。虽然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有利于他们更好融入当地社会,但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活动的比例并不高,仅有三分之一左右^[16-17]。也有学者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行为与父辈进行对比,发现与父辈一样,青年流动人口很少参加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18],年长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活动比例高于青年流动人口,原因是青年流动人口生计和工作压力更大,时间精力较少,来城市时间较短,与本地人交往较少,社会网络比较狭窄等^[19]。

在志愿行为参与者动机方面,Frisch等认为,志愿者行为动机只有两类:利己和利他^[20]。有着更强烈亲社会倾向、利他主义动机和志愿精神的人更可能参与志愿活动^[21-22]。Ward等将志愿行为动机分为行动导向型、人力资本导向型和产出结果导向型^[23]。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志愿活动不是单纯的奉献精神,而是体现出他们利用个体行为转化的方式满足获取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工具性动机,身份建构和生活方式自主选择的主观性动机,以及追求公民权和社区融入的社会性动机^[24]。

影响参与志愿活动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学因素、资本因素和其他因素。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与婚姻状况。在性别方面,美国劳工部^[25]调查显示,女性对帮助的认同感(可显著预测志愿者行为)更高,更可能成为志愿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志愿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26]。Wilson认为,年龄和性别存在交互作用,对年轻人而言,女性花费更多时间参与志愿活动,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情况却是相反的^[27]。婚姻方面,已婚者比未婚者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活动^[28],因为已婚者往往比未婚者有更多的收入^[29]。资本因素包括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与身体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收入、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提升会增加志愿行为发生所需的技能、精力、资金等条件以及志愿机会,从而增加志愿行为发生的可能性^[30-31]。在教育方面,中专到大专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初中或本科学历以上的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32]。另外,居住年限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志愿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居住时间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在外部条件上,有空余时间、参与志愿活动空间距离较近、有专门招募青年流动人口志愿者的情况等,也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33]。

为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行为,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包括:一方面,运用组织化的力量,如政府将志愿参与与自主创业、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关联,促进公益活动信息有效传播,志愿组织进行流动人口志愿者招募等;另一方面,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赋能,如通过培训等方式增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参与能力,让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合适的志愿参与项目和时间等^[34-35]。

以往研究多集中在流动人口整体(有的是农民工)志愿参与状况上,一些探讨影响因素的文章多缺乏理论支撑。为此,本文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论流派。这一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36]。该理论以个人行动具有目的为基础,认为社会行动者将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拥有的资源,基于利益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社会行动^[37]。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以往文献,我们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否参与志愿服务行为,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行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他们努力融入城市社会,以期获得城市的社会福利覆盖,以及在城市中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是其基于拥有的资源来选择是否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些资源包括他们自身的人口因素、资本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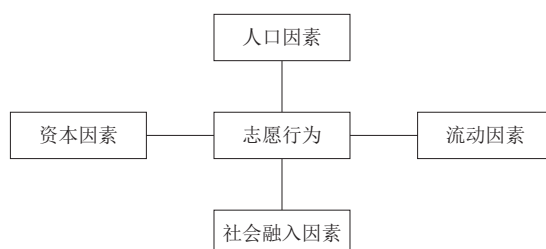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列联分析描述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行为状况;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行为影响因素的考察,因为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参与或不参与志愿服务),我们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模型为 $\text{logit}(p)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p X_p$ 。

本文使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在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地对那些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且至2017年5月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除外)进行调查,调查覆盖全国。该调查数据权威性强、样本量大、代表性好。本文研究对象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经过整理,最终样本量为96 050人。

(三)变量测量及描述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参加过赋值为1分,从来没有参加过赋值为0分。其中,志愿服务是指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

在自变量中,人口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分为“80后”和“90后”)和婚姻(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三个方面。资本因素包括五个方面,即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政治资本(用是否为党员测量)、经济资本(用收入对数测量)、文化资本(用受教育程度测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类)、健康资本(用自评健康测量,分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三类)和社会资本(用参与本地的相关活动测量,包括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其他等6项活动,都没有参加赋值为0分,参加赋值为1分,取值范围为0-6分)。流动因素包括流动类型(分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城市向城市的流动)、流动范围(分为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时间(采用流入本地的时间来测量)。社会融入因素有8个选项:“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

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分别赋值0、1、2、3分。在操作化中,将第5、6、7题的答案倒置,全部完全不同意为0分,全部完全同意为24分,并且,如果量表指标内部一致性检验 $\alpha=0.75$,说明效度较好。

总体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性别差异小,“80后”占比为63.30%;有配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四分之三;九成以上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水平;接近95%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不是党员;接近九成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认为自己身体健康;85%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乡——城流动人口;接近一半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为跨省流动。另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为5.39年。

表1 变量描述

分类变量	特征	频数	比例	分类变量	特征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45 684	47.56	健康资本	健康	85 455	88.97
	女	50 366	52.44		基本健康	10 024	10.44
年龄	“80后”	60 798	63.30	流动类型	不健康	571	0.59
	“90后”	35 252	36.70		乡——城流动	81 670	85.03
婚姻	有配偶	71 984	74.94	流动范围	城——城流动	14 380	14.97
	无配偶	24 066	25.06		跨省	46 308	48.21
文化资本	小学及以下	6791	7.07	省内跨市	省内跨市	32 709	34.05
	初中	40 119	41.77		市内跨县	17 033	17.73
	高中/中专	25 092	26.12				
	大专及以上	24 048	25.04	连续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健康资本	健康	85 455	88.97	经济资本	8.72	0.59	12.21
	基本健康	10 024	10.44	社会资本	0.82	1.04	6
	不健康	571	0.59	社会融入	16.82	3.28	24
政治资本	党员	4584	4.77	流入时间(年)	5.39	4.89	44
	非党员	91 466	95.23				

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融入、流入时间的最小值均为0。

三、结果分析

(一)总体志愿服务参与状况

新生代流动人口总体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率并不高,为38.58%^①,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杨菊华等^[38]发现,北京仅有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参与过志愿服务活动,主要原因是青年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大,时间精力用于工作,无法参与志愿活动;从社会网络看,他们来北京时间较短,没有建立起本地化的社会网络,很难方便快捷地获取志愿参与的信息,志愿参与的机会减少了。

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还存在性别、年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健康资

① 计算方式为参与过志愿服务活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总体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例。

本、流动类型、流动范围等方面的显著差异。男性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比女性高5个百分点,这与以往女性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更高的结论相反。这可能因为志愿服务活动中包括了献血,由于男性和女性生理条件上的差异,男性献血的可能性比女性高。也可能因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正直青壮年,相比男性,女性的家庭和工作负担更重,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和精力更少。“80后”与“90后”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行为的比例相差5个百分点,“80后”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比例稍高。这是因为“80后”来城市的时间比较长,收入较高,资源更多,信息丰富,导致他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机会比较多。有配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没有配偶的相比基本没有差别,说明婚姻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作为文化资本,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也在提高。受过更高教育的人从事志愿服务的意识会更强,也更有可能被邀请去做志愿者。有60.1%的党员参与过志愿服务活动,比非党员高出22.6个百分点。一方面,《党章》明确要求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这是对党员的利他要求,使党员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另一方面,党员有组织,接触志愿活动的机会也比非党员多。自认为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高于不健康的。城——城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明显高于乡——城流动人口,可能是城——城流动人口原来所处环境与现在流入城市较接近,参与志愿服务的环境变化不大。跨省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为35.92%,低于省内跨市的和市内跨县的比例。这可能是由于流动范围越小,越容易熟悉和习惯周围环境,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 2 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状况

变量	特征	比例(%)	变量	特征	比例(%)
性别***	男	41.01	政治资本***	党员	60.10
	女	36.37		非党员	37.50
年龄***	“80后”	40.61	健康资本***	健康	38.21
	“90后”	35.07		基本健康	41.93
婚姻	有配偶	38.73		不健康	35.03
	无配偶	38.11	流动类型***	乡——城流动	37.04
文化资本***	小学及以下	23.44		城——城流动	47.28
	初中	31.65	流动范围***	跨省	35.92
	高中/中专	40.98		省内跨市	40.72
	大专及以上	51.90		市内跨县	41.68

注:*代表卡方检验的显著性,其中*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多因素分析

本文构建了四个模型,分别考察人口因素、资本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的净作用。在模型一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作用都显著。在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179($e^{0.165}$)倍。在婚姻方面,有配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没有配偶的0.914($e^{-0.090}$)倍。在年龄方面,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

的可能性是“90后”的 $1.292(e^{0.256})$ 倍。

加入资本因素后,模型二的解释能力显著提升,但婚姻的作用变为不显著。随着收入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收入对数平均增长一个单位,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为原来的 $1.185(e^{0.170})$ 倍。受教育程度越高,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高,相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分别是其 $1.352(e^{0.302})$ 、 $1.863(e^{0.622})$ 和 $2.385(e^{0.869})$ 倍。身为党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普通群众的 $1.477(e^{0.390})$ 倍。相对于健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基本健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新生代健康流动人口的 $1.234(e^{0.210})$ 倍,不健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健康的 $1.306(e^{0.267})$ 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为增加前的 $1.827(e^{0.603})$ 倍,说明社会资本越多,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高。

加入流动因素后,模型三的解释力增强。流入时间、流动范围都有显著影响,但流动类型却没有。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分别是跨省的 $1.145(e^{0.135})$ 倍和 $1.253(e^{0.226})$ 倍,即流动范围越小越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流入时间每增加一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为增加前的 $1.021(e^{0.021})$ 倍,即流入当地的时间越长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高,但增加的幅度很小。

加入社会融入因素后,模型四的解释力继续增强。社会融入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为增加前的 $1.067(e^{0.065})$ 倍,即社会融入水平越高,新生代流动人口越可能参与志愿服务。人们越愿意融入当地,就越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为乡——城流动的 $0.922(e^{-0.081})$ 倍。

表 3 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模型一 B(SE)	模型二 B(SE)	模型三 B(SE)	模型四 B(SE)
性别(女性)	0.165*** (0.013)	0.086*** (0.014)	0.124*** (0.017)	0.128*** (0.017)
婚姻(无配偶)	-0.090*** (0.017)	-0.022 (0.020)	0.024 (0.031)	0.040 (0.031)
年龄(“90后”)	0.256*** (0.016)	0.242*** (0.017)	0.026*** (0.021)	1.250*** (0.021)
经济资本		0.170*** (0.013)	0.214*** (0.016)	0.204*** (0.017)
文化资本(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02*** (0.032)	0.344*** (0.036)	0.322*** (0.036)
高中/中专		0.622*** (0.033)	0.649*** (0.038)	0.604*** (0.038)
大专及以上		0.869*** (0.034)	0.889*** (0.040)	0.817*** (0.040)
政治资本(非党员)		0.390*** (0.034)	0.382*** (0.043)	0.378*** (0.043)
健康资本(健康)				
基本健康		0.210*** (0.023)	0.227*** (0.027)	0.277*** (0.027)
不健康		0.267** (0.093)	0.164 (0.103)	0.198 (0.104)

续表

变量	模型一 B(SE)	模型二 B(SE)	模型三 B(SE)	模型四 B(SE)
社会资本		0.603*** (0.007)	0.594*** (0.009)	0.582*** (0.009)
流入时间			0.021*** (0.002)	0.018*** (0.002)
流动范围(跨省)				
省内跨市			0.135*** (0.019)	0.088*** (0.020)
市内跨县			0.226*** (0.023)	0.145*** (0.024)
流动类型(乡—城流动)			-0.042 (0.027)	-0.081** (0.027)
社会融入				0.065*** (0.003)
截距项	-0.640	-3.195	-3.885	-4.815
似然比	487.12	12 083.76	8575.08	9150.24
卡方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伪R ²	0.004	0.094	0.096	0.102

注:(1)*=p<0.05,**=p<0.01,***=p<0.001;(2)括号内为参照类。

四、结论与思考

虽然新生代流动人口数量在总的流动人口数量中已经超过了一半,但我们看到,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并不高。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志愿服务方面还存在多重障碍,这影响着他们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研究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健康资本、流动类型、流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人口因素、资本因素、流动因素、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都有显著作用。因此,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去,需要个人、社区、社会组织、政府、社会的共同发力。

在个人层次上,那些性别为男性、具有党员身份、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发生城——城流动、身体健康的“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示范作用,参加更多的城市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也要创新符合对象特征的志愿服务形式和服务方式,让更多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如新生代流动人口直接将老生代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帮助老生代流动人口更好地利用现代网络出行、看病等。再如,在节假日期间,来城市时间较长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用其社会网络,发挥桥梁作用,带领其他新生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志愿者一同为城市的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等服务。

社区和志愿服务组织要充分发挥作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主阵地的作用。在志愿服务信息提供上,社区可以建立志愿服务信息港,保障社区各类人群都能看到此类信息;在志愿服务培训上,社区居委会可以搭台,引进专业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志愿服务培训,提升流动人口志愿服务的能力和志愿动机,对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来城市时间比较短、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是如此。如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养老服务技能等。在志愿服务需求

上,社区和志愿服务等组织要考虑到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的实际,如时间紧张,精力有限等,将志愿服务活动放在节假日或周末,鼓励更多新生代流动人口加入进来。

在政府和社会层面,除了积分落户等政策外,要大力宣扬志愿服务,特别是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在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城乡接合部,加大宣传志愿服务的内容、特点和社会效益;在新生代流动人口集中的工厂、企业,加大志愿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在政策设计上,加大志愿服务的鼓励力度,如在新生代流动人口培训、子女就学、租房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 [2]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 [3][32][33][34] 王新云:《外来务工青年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 [4] 肖子华 徐水源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以50个主要人口流入地城市为对象》,载《人口研究》,2019年第5期。
- [5] 夏贵芳 朱宇等:《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载《地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3期。
- [6] 孙忆萱 贾忠伟:《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分析》,载《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6年第5期。
- [7] 侯东栋 王晓慧:《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载《西北人口》,2018年第1期。
- [8][9] 王桂新 胡健:《城乡——区域双重分割下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距离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
- [10] 于忠海 张雨清:《流动人口子女就地入学的教育融入职责分担研究》,载《中国教育学刊》,2015年第11期。
- [11] 陈湘满 翟晓叶:《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 [12] 文雅 朱眉华:《探索“社会支持”为本的社会工作干预——以上海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服务为例》,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13][14] 段成荣 靳永爱:《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载《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2期。
- [15] 赵玉峰 扈新强:《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民族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实证研究》,载《西北人口》,2019年第2期。
- [16] 颜咏华 郭志仪:《多维视角下甘肃省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载《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4期。
- [17][19][35][38] 杨菊华 张莹等:《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比较研究》,载《青年研究》,2013年第4期。
- [18] 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 [20] Frisch M. B., Gerrard M. Natural Helping Systems: A Survey of Red Cross Volunte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1, (5).
- [21] Clary, Gil E., Snyder. et al. The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Wiley – Blackwell), 1999, (5).
- [22] Omoto A. M., Snyder M. Sustained Helping without Obligation: Motivation, Longevity of Service, and Perceived Attitude Change among AIDS Volunteers, J Pers Soc Psychol, 1995, (4).
- [23] Ward A. M, McKillop D. G. An Examination of Volunteer Motivation in Credit Unions: Informing Volunte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nals of Public &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11, (3).
- [24] 王斌:《个体化的助人者: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分析》,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25] BOL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Media Contact: Volunte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2009, 2010.
- [26] Hart D., Donnelly T. M. et al. High School Community Service as a Predictor of Adult Voting and Volunteering,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7, (1).
- [27][30] Wilson J.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1).
- [28] Chamber S. Is Volunteering A Substitute for Role Loss in Old Age? An Empirical Test of Activity Theory, Gerontologist, 1984, (3).
- [29] Fischer L. R., Mueller D. P. et al. Older Volunteers: A Discussion of the Minnesota Senior Study, Gerontologist, 1991, (2).
- [31] Matsuba M. K., Hart D. et 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 Structural Influences on Commitment to Volunteer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7, (4).
- [36] 杨善华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 [37]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3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责任编辑:刘彦)